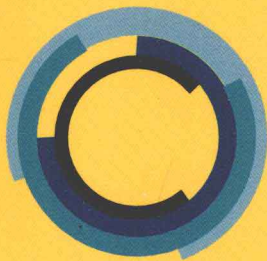


◀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

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蔡美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术原创系列

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蔡美华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 蔡美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309-07408-6

I. 党… II. 蔡… III. 真理的标准 - 研究 IV. B0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7040 号

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蔡美华 著

责任编辑/李 婷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88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08-6/B · 35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以党报为主体的各类新闻媒介在随后的拨乱反正中积极发挥宣传、组织、特别是舆论先行的作用,为即将兴起的改革开放大业进行思想和舆论准备。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深的是1978年出现并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对于这场大讨论的研究,虽已有不少成果,但因其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仍有继续向深处发掘的必要。蔡美华博士的这本专著,着重探讨中央和各省级党报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为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虽不能说是开山之作,但在同类研究成果中发掘较深、描述较细,并发现了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历史细节,如《人民日报》最先发表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等。这本专著与其他同类著作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其他同类著作大多围绕《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时间的推延而展开大讨论的种种事象,而这本专著则认为,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是不可能全由一篇文章来完成,也不会以一个论题线性地展开的。因此,这本专著基于对材料的悉心梳理,勾勒出了由主副论题为经线,中央及中央党报、地方党委及地方党报态度作为纬线的立体推进大讨论的轮廓和轨迹,发现这场大讨论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副题是民主法制宣传。

在大讨论中,地方党委和党报或积极响应、或共同抵制、或迂回对峙,其中不少老一辈的党报工作者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在复杂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大讨论。随着材料研读的深入,隐藏在每个有关文本背后的作者的真实内心世界也逐渐凸显,尽管这些文章粗略看去似乎相差无几,如有一个发文参加大讨论的作者,曾在1966年参与起草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于是在阐述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就有了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语句,这说明参与讨论者的文章虽在宣传实践标准,但其真实思想因自身的经历、立场观点等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这就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党报史提供了线索和路径。

更为可喜的是,蔡美华撰写的这本专著,并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这场大讨论的历史意义和党报在历史关键时刻如何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等问题,从而揭示出这场大讨论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即不能将党性原则简单误读为组织服从,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的高度统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30年前的这场大讨论提出的问题及其回答至今仍有重大意义。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思想解放的问题,尽管与30年前通过大讨论解放人们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党报开展不同思想的争鸣未必导致社会失序,反而能够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不合时宜的理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狭隘的既得利益和平庸的政治短视困境中解放出来。

此外,这部专著对这段党报史的基本看法,尽管仍在党的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内,但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某些观点容或有所不当,但就学术探讨而言裨益甚多。

是为序。

黄 翔

2010年5月2日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两个凡是”禁锢下的后“文革”党报	10
第一节 “文革”宣传模式的沿袭	10
一、提出“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	11
二、新的个人崇拜的宣传	13
第二节 乍暖还寒的拨乱反正宣传	17
一、平反冤假错案的起步	18
二、《人民日报》内参催生高考制度恢复	25
三、“文革”话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尴尬	30
第二章 真理标准讨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起、展开和推进	35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端	35
一、《人民日报》——真理标准讨论的发源地	35
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敢为天下先的独特论坛	39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写作与发表始末	44
第二节 实践标准论和“两个凡是”论的尖锐对峙	53
一、积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央媒体：在批评指责声中坚持	53
二、《解放军报》对“凡是派”责难的回击	62
三、“一花独放”的《红旗》杂志及其成因	67
第三节 为真理标准讨论清障的《人民日报》民主法制宣传	72

■ 2 ■ 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一、民主法制宣传的主要样式与基本内容	72
二、民主法制宣传的作用	74
三、民主法制宣传的局限性	78
第四节 1978 年中央党报有关文章统计	80
一、1978 年《人民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81
二、1978 年《光明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89
三、1978 年《解放军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96
第三章 地方报纸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积极回应	101
第一节 与“三不”禁令抗争的上海报纸	102
一、《文汇报》的迂回宣传策略	102
二、冲破“三不”禁令的标志	110
三、《解放日报》参与大讨论的宣传特色	112
四、1978 年上海报纸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115
第二节 最早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省报——《黑龙江日报》	126
一、黑龙江省委率先表态对推动大讨论的意义	127
二、为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扩容改版	131
三、1978 年《黑龙江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138
第三节 《南方日报》：紧密联系改革实际的大讨论	145
一、《南方日报》较早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146
二、对省领导民主作风的报道为大讨论营造宽松环境	147
三、对农村极“左”路线的批判	149
四、1978 年《南方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151
第四章 在大讨论中逆向而为的部分地方报纸	156
第一节 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湖南日报》	156
一、对“两个凡是”提倡者的过热宣传	156
二、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大力宣传	158
三、《湖南日报》抵制大讨论探源	160

四、1978年《湖南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162
第二节 扭曲走样的《山西日报》大讨论	166
一、与全国多数报纸大相径庭的《山西日报》	167
二、变味大讨论宣传的直接恶果	169
三、《山西日报》的深刻教训	170
四、1978年《山西日报》有关文章分类统计	172
第五章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开展	180
第一节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缘起	180
一、理论务虚会：尚未结束的争论，步履艰难的会程	180
二、一波三折的党报农村改革宣传	182
三、参差不齐、极不平衡的各地大讨论	185
第二节 党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始末	187
一、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综述	187
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特点	192
第三节 新华社地方广播通俗宣传：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 成功案例	199
一、通俗宣传的策划和实施	199
二、通俗宣传成功的有益启示	201
第六章 党报成功宣传真理标准讨论的原因和启示	204
第一节 党报真理标准讨论成功开展的原因	205
一、党报深切反映了党心民心的强烈诉求	205
二、恢复了党内民主，党报成为追求真理的舆论平台	206
三、党报强化了自身建设，丰富了宣传手段	207
四、邓小平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大力支持和领导	210
第二节 党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启示	216
一、党报在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错误思潮的 过程中，始终坚持思想性、政治性、组织性的统一，并将这 三性统一于民心民意	217

■ 4 ■ 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二、党报和党中央决策的互文性	218
三、党报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宣传策略	221
附 录	223
一、1978 年 1 月 9 日《人民日报》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	223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三个版本	228
1. 第六次修改稿：《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228
2. 《光明日报》集体修改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235
3.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46
参考文献	255
后 记	261

绪 论

1978 年我国党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因讨论的是政治问题、思想路线问题而往往容易遁出新闻传播学界的视野。尽管研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大多属于政治学、哲学和党史的范畴。另外,西方学者对大讨论也有些述评。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李查德·伯曼的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呈周期性变化的趋势,即宽松——混乱——控制——严苛。而中国高层领导的不同意见会导致开放发展周期受到干扰,而且这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冠以神秘含混的符号概念,如两个凡是派、检验真理标准派,在这些符号概念下,隐藏着的是内在的相当多的不和谐音。书中有很详尽的所谓中共高层的不同意见的叙述。在貌似客观分析论述的表象下,难掩其意识形态的局限和偏见,该书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存在着不少错误读解。

当然,也有持论较为公允的。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6 期出版的《中国季刊》中有 Michael Schoenhals 的一篇文章《1978 年的真理标准争论》(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该文持论还是比较公允的。作者认为,中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中国言论自由的进步,言论自由的进步必将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当然,强调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责任,言论自由要以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为底线,言论自由不能引发社会混乱和

震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 1978 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非常成功的。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专家沈宝祥教授曾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立项作专门研究,并出版了著述《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该课题约 30 万字,其主要成果是:(1) 搞清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要史实;(2) 提出了一些有关党史研究的学术观点;(3) 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党史方面的文献资料。该课题是从党史的角度研究的,党报在大讨论中的作为被淡化处理,因此作为成果的某些结论也为党报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 2008 年第 4 期发表了莫志斌、唐去非的文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研究述评》,该文将真理标准讨论研究分成如下几类,即对大讨论的起因、拉开序幕的标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大讨论的分期、大讨论中的焦点与实质问题、讨论的作用与影响、意义,以及大讨论的开展与胡耀邦、邓小平、胡乔木等人的关系问题等的研究。文章认为大讨论研究“过多地纠缠于讨论中的一些细节与学理层面上的争论,如文章的作者、讨论的起止时间等细节,而研究的视野还有待进一步扩展”。这从某种意义上提示了以新闻传播学党报理论视野研究大讨论的必要,但对作者批评“过多地纠缠起止时间等细节”不敢苟同。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探究其中细节,其意义并非无足轻重。如对真理标准讨论起止时间的追问——本研究将最早发表有关文章上溯到了 1978 年 1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风和认识路线》,这并非只是简单的日期的修正和改动,而是关涉党报对“两个凡是”的高度敏感、忧虑和警惕,并已先于其他部门作出努力,试图在理论上提醒人们对这个带有“文革”烙印问题的认识。另外,文章作者的研究也并非只关涉功劳的归属。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应《光明日报》编辑约稿的产物,该文在《光明日报》编辑主持下的多次修改及后来报社领导编辑的集体修改,都彰显了党报对大讨论的重视、组织和参与。中央党校在光明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作了改写并加上了小标题,使文章的主题更明确,层次更清晰,功不可没,但也不尽完美,在党校的改写稿中加入的某些论据就不甚妥帖。因此,被该文作者批评为在一些细节上纠缠不休的地方,在笔者看来正是有待新闻传播学、党报史学深入研究并作出客观科学判断的学术话语空间。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在《理论学刊》发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反思》一文指出:对于教条主义,实践是一副真正有效的解毒剂。因此,确立理性的至上地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任务,而确立实践的至上地位则构成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真理的实践标准就像一把“奥卡姆的剃刀”,拒绝形而上学,解构宏大叙事,颠覆“乌托邦”,但也潜含一种危险,就是理想主义被一同埋葬。另外,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往往使人过于直观地看待历史行为的客观后果,而难以从长时段来预期未来的潜在风险,从而犯过于短视的错误。所以,它也无法解决信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理标准讨论的这一局限性清晰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着力防范这样的情形发生,即它的局限同它的贡献一样多。因为学理上的某种先天不足,极有可能被转换并放大为实际的历史后果,关键在于通过对这场讨论的潜在意义的深刻反省,把其中最具有正面价值的维度最大限度地诱发并展现出来,抑制其消极意义的维度,以便尽可能地消除其负面的影响。尽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旨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但是,在当今社会普遍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物欲膨胀的情况下,以哲学的学科背景

和视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作这样的反思是完全必要的。

方汉奇教授主持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记录了党报开展这场大讨论的主要过程和重要事件,并作了评价:“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新闻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两个凡是’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组织和发表这种主题的文章,开展这样一场讨论,要冒很大的风险,要有很大的勇气。在这场讨论中,广大新闻工作者出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上,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和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创造性,旗帜鲜明、勇敢无畏地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场大讨论,为党和人民立了功。”囿于篇幅,在该通史中只勾勒了党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概要,而党报如何冒着巨大的风险展开这场讨论、地方党报或抵制或支持大讨论等详情未及展开论述。

余焕椿除了在《党史文苑》撰文《罗瑞卿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外,还在2008年5月15日的《南方周末》发文《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新闻交锋》,文章提出了大讨论中存在着两个司令部和两支队伍的观点。他认为,“文革”中的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虚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真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两个凡是”司令部,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另一个是“实践标准”司令部,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前者是实权派,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后者是实力派,拥有绝对优势的理论队伍。与此相对应还有两支队伍。如党校的吴江、孙长江,《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何匡、汪子嵩,《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新华社的曾涛、赵慎应、蒋涵箴,《解放军报》的华楠、姚远方等。社科院、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各部委、高校都有不少理论人才参与。地方上具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执笔人。

“两个凡是”队伍显得单薄,主要是毛泽东著作办公室李鑫、吴冷西,《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除了提出“两个凡是”的那篇社论外,未见过什么给人印象的文章。党报恰是两个司令部、两支力量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战场。

因此,仅仅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归入政治学、党史范畴,却忽视了这场大讨论不仅主要媒介为党报,且讨论的展开无不关涉党报的理论宣传、编辑、排版策略等新闻传播学内容,不但有粗略化、简单化之嫌,而且遮蔽了其中的许多重要党报史实及其所蕴含的党报理论意义。

研究发现,在这场大讨论中,党报并非仅是实践标准论者替代、置换“两个凡是”论者的舆论工具,更是党报工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顺势而为推动社会进步精神的张扬。他们曾跟从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起步办报,曾经服膺他们的人格魅力,也逐步洞察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党报工作者对“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冷静地落下了审视的目光,不再诚惶诚恐,也不再亦步亦趋。他们根据党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优良的传统作风,自主辨别上层不同意见的是非,在当时主导中央决策的“凡是”派之外,大胆反映暂时处于非掌权派的党的元老和老革命家的正确观点和主张。这是党报史上的一个罕见的现象:党员、党的分支机构通过共同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相濡以沫,声气相求,在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党报进行宣传和辩论,努力影响党的决策。很多具有震撼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就是从中央党校发源,通过中央党报向全党、全社会发布,在中国大地上轰响着除旧布新的春雷。

在这场大讨论中,党报的“器官”全面觉醒,它们不再仅仅成为党中央的“喉舌”,同时决心成为党的“耳目”、全民族的“大脑”;它

们不计毁誉得失,唯真理是从,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它们用多年苦难积淀的智慧,命运沉浮摧折不了的勇气,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唤起中国人民大觉醒中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完成党和国家的伟大变革,成就了党报史上华彩的篇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的真实完整永远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本研究的着力点虽不是宏大叙事,也没有刻意挑战传统的历史框架,而是以新闻传播学、党报理论的学科视野,依靠扎实的史料考证,突破盲点,刷新成见,还原这段党报史的真相。其中包括中央党报如何分工合作,中央和地方党报如何互文互动,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打破僵局,大讨论经历哪些阶段等,在此基础上探讨这场大讨论成功的原因并揭示其理论意义。这些对于党报宣传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推进党内外民主、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囿于篇幅,本书不可能对所有党报逐一介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最早是由《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等媒体发表的,并与《红旗》杂志等媒体引发了激烈的斗争,这几家媒体是论述的重点。地方(省、市、自治区)党报有如下三类,党委消极抵制大讨论而其所属党报以迂回的策略开展大讨论的、党委及其所属党报都积极回应中央党报大讨论的、党委及其所属党报对大讨论都消极抵制的,在这三类地方党报中各选两家加以详述。与上述分类相对应,它们分别是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日报》和广东省的《南方日报》、湖南省的《湖南日报》和山西省的《山西日报》。时间跨度为1977年至1981年,重点是从内容分析和量的描述来详细论述这些党报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态度、表现在版面上的反映,勾勒出大讨论的轮廓和发展脉络。大讨论期间,党中央内部主张实践标准的人和“两个凡

是”派之间,党报和党中央之间,地方党报和地方党委之间,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之间有着种种复杂的关系,本书尝试通过揭示其中或斗争、或观望、或遥相呼应、或提供支持等关系来还原这段重要的党报史。对讨论过程中的某些重要事件,有详尽细致的量的记录和超越文本本身的分析和解读。

口述历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可以和文字史料互相对照,互相补充,逐步逼近历史真相。作者曾北上访问当年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新闻界前辈,如《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余焕椿、人民日报社《市场报》副总编辑(原新华社记者)蒋涵箴、《人民日报》理论部原副主任汪子嵩、《文汇报》原总编辑马达等。他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有的史实是首次公开披露,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业界人士的视角阐述了大讨论期间有关事件的意义及诸多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口述历史能把原始文献的文字记载激活,展现出当年活灵活现的历史画面,填补弥合文献记载中的重大遗漏,尤其是对文献作出符合当时情境的客观阐释和解读,这既有助于作者避免史料碎片化或简单堆砌,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误读和拔高。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党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缘起和时代背景,主要论述了两年徘徊期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因“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党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极“左”路线极其艰难且不彻底,党报园地乍暖还寒。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

第二章讲述党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和遭遇的阻力。《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后受到当时中央高层领导的严厉指斥,为缓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压力,发起反击“两个凡是”论者责难的任务转至《解放军报》承担。《解放